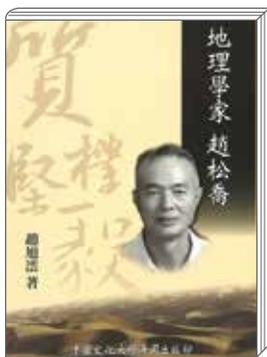


介述《質樸堅毅：地理學家趙松喬》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副教授 | 李仕德



質樸堅毅：地理學家趙松喬

趙旭澐著／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出版部／201406／380頁／23公分／450元／精裝
ISBN 9789865709174／782

趙松喬（1919-1995），浙江東陽縣人，為宋太祖趙匡胤之弟魏王趙匡美 32 世裔孫，是中國地理學，尤其是中國乾旱區地理研究的泰斗。初中以前在家鄉東陽縣渡過慘綠少年的歲月，1934 年考上著名的浙江省杭州高中，在高中時，趙松喬每天讀書 14 小時左右，星期天及寒暑假都不例外，成績因此名列前茅，並以優異成績畢業，趙松喬原擬參加清華大學入學的考試，唯因七七事變爆發，全國大學入學考試停擺，最後只得回到老家東陽，一方面參加當地「假期回鄉學生戰時服務團」的抗日救亡運動，一方面準備課業等待時機。

及 1938 年初，時因戰火西遷到江西泰和的國立浙江大學舉辦招生考試，其史地系設有「黃膺白獎學金」，名額一名，這對新婚不久的趙松喬深具吸引力，於是趕到江西泰和應試，結果趙松喬以 565 高分（按當時大學入學考試科目應是國文、英文（或德文、法文）、數學、物理、化學和生物六科），以浙江大學全校入學考試第一名的成績進入史地系，同時如願獲得黃膺白獎學金的獎助。

1938 年秋，趙松喬前往因戰火而再度遷移到廣西宜山的浙江大學註冊，同時在開學典禮上，聆聽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1890-1974）以「王陽明先生與大學生的典範」為題的演講。竺可楨為哈佛大學博士，原任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所長，於 1936 年應邀出任浙江大學校長，其辦學理念是中西文化兼容並蓄。竺在浙江大學 13 年期間（1936-1949），浙大聲譽鵲起，與北大、清華、南開等校齊名，甚至被李約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譽為東方的劍橋。竺可楨在開學演講中，鼓勵浙江大學的學子要以王陽明為榜樣，在困境中接受磨難，不屈不撓，希望同學力行「求是」（Faith of Truth）的精神，也即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只問是非，不計利害的精神。這種「求是」的精神往後成為趙松喬一生追求學術卓越的座右銘。

竺可楨任浙江大學校長後，即延聘其高徒張其昀（1901-1985）到校創設史地系，其後陸續增

設史地研究所，張身兼系主任、所長及文學院院長。張其昀為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今國立中央大學及南京大學前身）的高材生，在校時師事柳詒徵、竺可楨諸人，南高畢業後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工作時，即主編《高中本國地理》，這本教科書當時與林語堂主編的《開明英文讀本》、戴運軌主編的《高中物理》，同為當時全國通用的三大中學教材。張其昀到臺灣後創辦了中國文化大學。

張其昀創設史地系時，倡史地系應綜合史學與地學精神，用以明時空之真諦，識造化之本原，至於高深研究則在研究所分設史學組、地形學組、氣象學組和人文地理學組。在史地系任內，張其昀延聘名師到校任教，諸如錢穆、張蔭麟、方豪、俞大綱、譚其驤等大師都在浙江大學史地系開課，浙大史地系一時間大師雲集。

趙松喬後來回憶其考入浙江大學史地系不久，有一次張其昀囑其從教室陪同步行至寓所，在長達 4 小時的談話中，張其昀諄諄教誨趙松喬要：（一）必須畢生勤懇治學和工作，只問耕耘，不問收穫；（二）發揚浙東學派經世致用的精神，以科學和教育救中國，並為全人類服務；（三）治地理學必須「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自然和人文相結合；（四）空間（地理學）與時間（歷史學）必須密切結合；（五）讀書必須苦學深思，要勤於分類做筆記和搜集資料。這些教誨讓趙松喬後來在學術研究上受用無窮。

1939 年為躲避日機的濫炸，浙江大學第四度遷校。這一次經長途跋涉，學校落腳於貴州遵義，到了遵義，學習環境才稍得安定。1942 年趙松喬大學畢業，隨即考取史地研究所並兼任助教，研究所畢業後在史地系擔任講師一年，並於 1946 年考取美國國務院提供的研究生獎學金，隨後即進入以地理學研究聞名的美國克拉克大學（Clark University）進修。在克拉克大學兩年時間裡，趙松喬每門功課都得 A 等，並且還利用暑假到加拿大麥基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暑期班教授地理學，其後在艾克布勞教授（Walter Elmer Ekblaw, 1882-1949）指導下完成博士論文，1948 年 5 月獲博士學位。

趙松喬獲博士學位後即整裝啟程歸國，隨後以二個多月的時間，自東徂西橫貫美國，沿途參訪著名大學，兼寓行萬里路，讀萬卷書之意，最後再從舊金山搭船返國，是年 9 月中旬船抵上海，時年 29 歲的趙松喬旋即回到杭州，前往浙江大學報到並擔任史地系副教授。

趙松喬歸國時，正值國共內戰方酣，1949 年 4 月 23 日解放軍攻佔南京，杭州局勢危急，趙的恩師張其昀決定由杭州搭乘最後一班火車，前去上海再轉往廣州，張請趙松喬代管浙大史地研究所的工作，而趙則親自到杭州車站送別恩師，面對此情此景自是感慨萬千。解放軍進入杭州後，隨即於 1949 年 6 月接管浙江大學，並查封張其昀的資料，不久後趙松喬也遭到解聘，趙旋即轉往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學地理系任教。

1950 年中共成立中國科學院，以郭沫若為院長，竺可楨為四位副院長之一，在竺可楨的支持下，中科院就原來中央研究院地理所，在南京成立地理所籌備處，竺可楨兼籌備處主任。1950 年 7 月趙松喬即轉往地理所籌備處擔任副研究員，1953 年中科院地理所正式成立，1958 年底趙松喬全家隨地理所遷移到北京。

自 1950 年 7 月進入地理所籌備處後，趙松喬隨即參與多項調查研究，其間對於中國乾旱和半乾旱地區的調查研究，相關專著論文近 200 多萬字，使他成為中國乾旱區和半乾旱區研究的開拓者，經常被稱為此一領域的開山鼻祖或一代宗師。1960 年代初期，曾有學者專家推估敦煌莫高窟在 30 年內有被沙子埋沒的危險，趙松喬進行研究分析後，他保證在 300 年乃至 3000 年內，莫高窟不會為沙漠所掩沒，才使相關單位打消莫高窟遷移案。

1966 年 5 月 16 日中共展開文化大革命，在文革動亂中，趙松喬因政治問題而成為地理所首批被「專政」的人員，隨後在 1969 與其妻子被下放到湖北潛江的五七幹校，一直到 1971 年文革逐漸退潮後，才在是年 9 月獲准回到北京工作。在文革結束後，趙松喬隨即更加積極展開其學術研究的工作，直到 1989 年，七十高齡的趙松喬仍深入被稱為「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瑪干沙漠進行考察。終其一身，趙松喬在中國自然區劃、土地類型研究、乾旱區研究、農業地理研究等方面獲得輝煌的學術成果，總計完成專著 16 部，中英文學術論文 200 餘篇，譯著 6 部，合計 500 餘萬字，可謂著作等身，成果豐碩。

趙松喬這些著作中，其英文專書 *Physical Geography of China*（中國自然地理）是 1984 年底，應美國著名出版商 John Wiley & Sons 之請而撰就的。第二本 *Geography of China: Environment, Resource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中國地理：環境、資源、人口和發展），則是首部中國綜合地理研究的英文專著，這兩本英文專書成為西方有關中國自然地理的重要教科書與參考書籍。由於趙松喬在乾旱地區研究的成果豐碩，美國出版商 Allerton Press Inc. 乃商請趙松喬擔任 *Chinese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earch*（中國乾旱區研究期刊）的主編，為中國乾旱區研究在國際間發行的首本英文季刊。

中國大陸在開革開放後，趙松喬亦積極展開與國際地理學界的學術交流，一直到去逝前，他風塵僕僕的奔走於亞洲、美洲和歐洲，或參加學術會議或在國外大學講學，學術成就蜚聲國際。民國 77 年臺灣開放大陸傑出人士來訪時，趙松喬是第一位受邀者。當時對受邀來臺學者的條件嚴苛，除了必須是非共產黨黨員以及非九三學社的成員外，且在其專業領域中需居前 10 名，後經中國文化大學董事長張鏡湖的推薦，趙松喬於民國 78 年成為第一位受邀訪問臺灣的大陸傑出學者，當時中央日報還稱趙為沙漠王。

1995 年趙松喬走完其人生的旅程，其留下的身影有如一座中國地理學的大山，令人望高山而仰止。其女兒趙旭瀟女士以兩年多時間，整理其父親的書稿遺物，同時訪問其父親的故舊門生，為追尋其父親留下的遺痕，趙女士從中國大陸、臺灣到美國，足跡遍履其父親生前走過的山川，最終寫下了這本傳記。本書不只是兒女思念父親的行狀之作，而是大篇幅紀錄其父親的師承和學術淵源，並從學術成就和國際交流等層面，記載一位不平凡的學者對中國地理學的貢獻。本書文字流暢，平實記錄一位質樸的學者，以堅毅的決心克服接二連三的困頓環境，最後雲開霧散，並在學術上開花結果，實踐以科學服務人類的初衷。